

一九三七年的留声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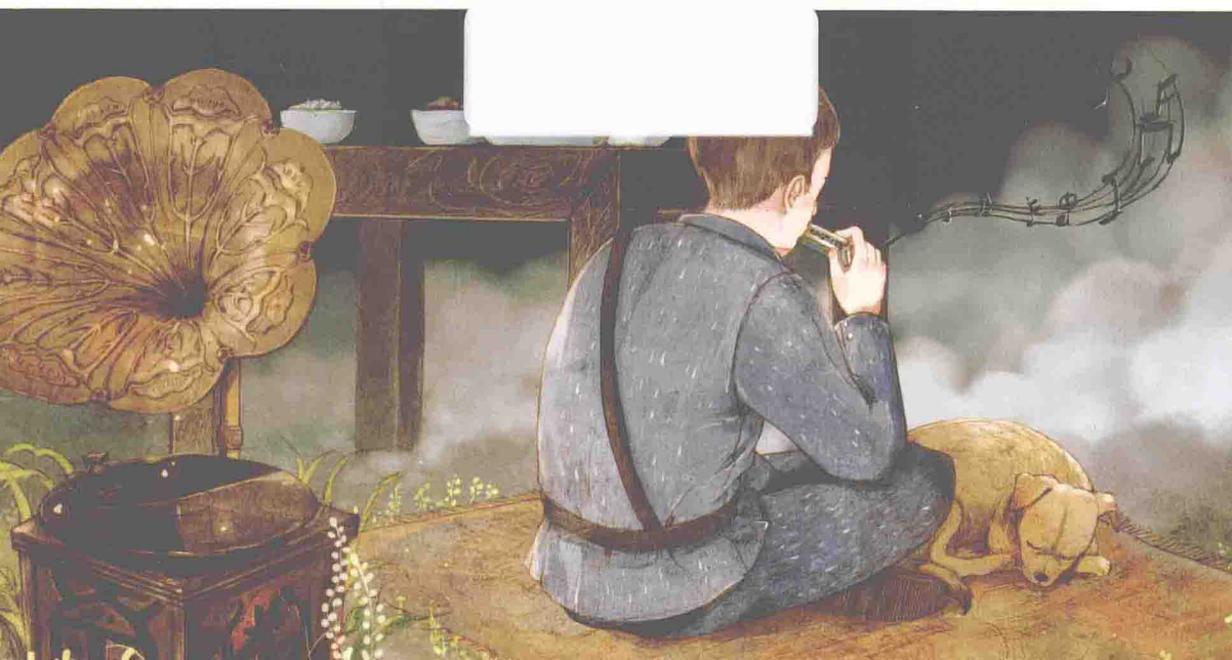
● 总主编 / 王蒙
执行主编 / 张清华



明天出版社

中国当代文学精华
儿童文学之外的阅读体验

中国当代小说少年读库





中国

当代小说

少年读库

总主编 / 王蒙

执行主编 / 张清华

本书编著 / 金铎

一九三七年的留声机

明天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一九三七年的留声机/金铎编著. — 济南: 明天出版社, 2015.6

(明天文学馆/王蒙主编. 中国当代小说少年读库)
ISBN 978-7-5332-8567-8

I. ①一… II. ①金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089994号

明天文学馆·中国当代小说少年读库

一九三七年的留声机

出版人/傅大伟

出版发行/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明天出版社

地址/山东省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

<http://www.sdpress.com.cn> <http://www.tomorrowpub.com>

经销/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/肥城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
版次/2015年6月第1版 印次/2015年6月第1次印刷

规格/170毫米×240毫米 16开 15.75印张 165千字

印数/1-10000

ISBN 978-7-5332-8567-8 定价/20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电话: (0531) 82098710

编者的话

两千五百多年前，孔子首开私学，由此诞生了一种东方式的教育。这种教育是一种综合的知识、人文、品德与人格教育，而教材则是诗歌，是文学，也就是《诗经》。

文学教育在一切教育中成为了缘起和根本。学习诗歌，从大处讲，可以为国家做事；从小处说，可以知道如何孝敬父母；从最低限度上说，可以学到很多知识。“不学诗，无以言”，连话都不会说，还能干什么呢？

我们从中获得的启示就是：要想让孩子得到良好的文学教育，培育深厚的人文素养与健全的人格，文学阅读必不可少。这便是我们编纂这套“明天文学馆”丛书的初衷与动机。

我们想在“儿童文学”的范畴之外，选取中外文学宝库中那些富有正面意义，有益于少年儿童的精神成长，适合少年儿童之接受能力，对其提高文化素养、知识积累、人格修为均有助益的部分，作为其课堂学习的补充和延伸。这些作品中富含人文主义传统，人生奋斗的精神，生命体验的精妙以及情感与道义的感人。我们期待它们对于生命与精神快速成长中的青少年们，能够有所帮助。在网络文化与流行文化充斥弥漫的今天，这样的阅读尤其珍贵和必要。

关于这本书

金 铎

人生最根本的经历和经验中，不幸与苦难是一对永不会缺席的双胞胎。它们之固执地存在，犹如幸福的另一面之相依相伴，如影随形。悲欢离合，阴晴圆缺，人世的经历变化万千，但最痛切的则是失去，最终的结局则是死亡。用《红楼梦》中的话说，这叫做“一朝春尽红颜老，花落人亡两不知”。所以有人说，人是啼哭着来到这个世界的，也是在别人的啼哭中离开的。就一般的哲学性理解而言，人们会把不幸和死亡看作人生的根本，而把中间的欢乐和幸福、青春和成长看作表象和过程。

所以，托尔斯泰的名言是：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，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。但其实，这话反过来也同样成立——不幸本身都是一样的，而幸福的人却各有各的幸福。

文学之所以迷人，是因为它总是关注、传达、升华并且释解着这些悲欢，关注着大到人类生存、小到个体生命的基本状况，因此，有

“文学即人学”的说法。而苦难作为人类生存的常态，一直是文学史上的重要的主题和基本的价值，从中外文学作品中最核心的部分看，作家对时代、历史和个体生命的参悟，总是与苦难、悲剧的体验密切相关。与此同时，文学也书写和表达着对于这些苦难的超越以及悲悯、承担与奋争，它们共同构成了文学中最深刻和感人的部分。

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，某种程度上也是一部苦难史的艺术呈现。早在《诗经》中就已出现了描写农夫艰辛生活的诗句，汉乐府中的《妇病行》、《孤儿行》，唐诗中的《兵车行》、《石壕吏》、《卖炭翁》，元散曲中的《赵氏孤儿》、《窦娥冤》等等，都是描写百姓的生活困境并体现其苦难命运的作品。总起来说，古代的写作者并不力图意识形态化地理解苦难，而多是个体化地予以书写与呈现。古希腊文学也是这样，因为质朴和敬畏而将一切不幸归之于命运，所以有所谓“命运悲剧”，典型的如《俄狄浦斯王》。这是古人自然而然的做法。

“五四”以来，启蒙主义观念对于文学影响巨大，改造国民性，拯救精神上麻木不仁的民众，成为文学的首要任务。鲁迅在解释其为何作小说时讲到：“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‘闲书’，而且将‘为艺术的艺术’，看作不过是‘消闲’的新式的别号。所以我的取材，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，意思是在揭示病苦，引起疗救的注意。”这种对“不幸”与“病苦”的关注，正是其现代意义上苦难意识与主题的彰显。在他的影响下，许多左翼作家如叶紫、柔石等都注意到对于底层百姓不幸的揭示，而许多其他的作家如老舍、曹禺等，也都有非常典型的苦难主题的书写。

当代文学更是以苦难为发端，早期是以阶级斗争的视角来书写

“阶级仇”、“血泪恨”，更加概念化地将苦难升华为革命的、阶级教育的主题。之后，这种故事在上世纪七十、八十年代之交，又演化为对“文革”悲剧的回忆与书写，从“伤痕文学”到“反思文学”，再到“寻根文学”，苦难似乎一直占据核心并演化为一个时代性的主题。王蒙、张贤亮、宗璞、邓友梅，这些中年作家，乃至刚刚崭露头角的冯骥才、梁晓声、路遥等青年作家，也都纷纷投身于对“文革”苦难的叙述。

至上世纪八十、九十年代之交，一群更年轻的作家如刘震云、刘恒、莫言、张炜、余华等，开始更关注普通大众的苦难遭际，而且在价值观上，他们力图以更宽阔的历史眼光，更具哲学高度的认识，来展现个体精神的困顿，以荒诞、漫画式的方式去颠覆正统的历史叙述，挖掘那些被封存的和湮灭的生存真相。这些哲学意味很强的书写，在世纪之交以来更年轻的一批作家们笔下，则又延伸和演化为对具体的底层困苦书写。因为社会的发展中蕴含了更多的分化，出现了更多个体的极端例证，如乔叶、陈继明等，都以更浓烈的苦难意识和人道情怀深入底层人物的悲酸生活中，关注那些特殊的群体，如农民工、城市弱势群体等，小说所体现的苦难，也正是他们在艰难生存中的种种不幸。作家们不再对苦难进行哲学性的处置或理想主义的超越，而是试图还原其真实的质感，以期引发社会应有的悲悯、自省与救赎。

其实，文学对于苦难的书写更多的是对社会、历史与文化的反思，他们用文字建构起一个个历史与现实中的缩影，以此实现对于人的生存状况的透析与观照。

苦难从广义上一般分为物质性苦难和精神性苦难。现实与物质意

义上的灾难与不幸，衣食住行中的困顿与短缺，超出个体承受能力的战争与瘟疫……这些差不多可以构成物质性的苦难；而精神性苦难，则指某些特殊的伦理或情感原因——诸如命运的多舛与不公、家庭破碎或身体残缺——所导致的心灵之伤与精神之痛，某些压抑的精神生活导致的个体精神世界的改变、扭曲与异化……事实上，我们也很难将物质性与精神性分开来谈，形而下的物质性苦难的出现，往往也是形而上的精神性苦难的开始，生活中的苦苦挣扎也必导致其精神上的迷惘和焦虑。

本书所选的九篇小说，皆以关注个体生存困境，倾听其灵魂孤独、绝望的声音为起点，呈现生命中的种种悲苦遭际，展现人们所经受的物质性苦难与精神性创痛，完成对生命与人性的领悟，解读人类生存苍凉和悲苦的真谛。作家们以平民化的视角，融入人物的内心世界，在真实地展现了生活中的苦难遭际的同时，也彰显了人物内心的痛楚和挣扎。这些作品中所包含的苦难涵盖了身体的残疾、生理的缺陷、生活的贫困等有形而可感的不幸，也包括了孤独与恐惧、绝望与疯癫的极端心理体验。

刘震云的《温故一九四二》是一部描写大饥饿的悲剧诗篇。一九四二年，河南大旱，蝗虫肆虐，灾民达五百余万。适逢日寇侵华，内忧外患，更兼当政者无德，出于狭隘的集团利益，对饥民惨状袖手旁观。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激发出人们最原始的生存本能，外出逃荒的饥民们要么以命相搏、弱肉强食，要么携妇将雏、相濡以沫，但终不免卖儿卖女乃至出卖良知。在这部小说中，刘震云用反讽和质疑的手法，完成了对历史的嘲笑以及对权力的讽喻。

刘恒的《狗日的粮食》也与粮食有关，饥荒年代让农村妇女曹杏

花对粮食有了病态的依赖，她因粮食而生，又因粮食而死。“饥饿”成为一种最为残忍的考验人类精神的方式，粮食的匮乏使人们陷入无止境的恐慌与苦难之中。小说对历史和现实中小人物的生存本相，给予了形象而生动的揭示。

东西的《没有语言的生活》讲述的是发生在一个不幸家庭中的悲惨故事。父亲、儿子和儿媳都不同程度地有生理残缺，所以，在生活中他们选择了隐忍，然而命运的不公并没有因这隐忍而减退。主人公所承受的不幸，远远超出了常人所能够设想的边界。异曲同工的还有刘庆邦的《小呀小姐姐》。小说中那个自出生起便与死亡抗争的罗锅弟弟平路，还有用爱坚强保护着不幸的弟弟的小姐姐，他们皆有与命运抗争的纯朴天性与坚强意志，但不幸的是对他们而言，一切反抗都是徒劳的。李锐的《扁担》讲述了一个农村打工者的悲惨遭际。木匠金堂还未在城市中找到工作便因车祸而失去了双腿，丧失了所有的谋生能力，也失去了最基本的人格尊严，无法在城市立足，他不得不怀着绝望，靠手中的鹅卵石“挪”回山乡。生理上的缺陷或是肉体上的疼痛对他们来说，固然是难以承受的不幸，但人世的冷漠与命运的不公才更加让人心寒和齿冷。

王瑞芸《姑父》中的主人公在“极左”的年代遭受摧残。一个原本拥有远大理想并充满激情的少年，因二十年的牢狱生活变成了一个心灵扭曲、人格异化且遭人厌恶的卑鄙人物。盛可以的《一九三七年的留声机》是一部以女性视角理解战争的小说。战乱年代，无论是侵略者还是被侵略者都要承担战争给身体、精神甚至是情感所带来的伤害，人的内心和精神上的恐惧是永难磨灭的。石舒清的《清水里的刀子》，主人公马子善老人通过一头成为祭品的老黄牛，完成了对死

亡这一终极苦难的带有神性和宗教意味的思考，实现了对于灵魂的救赎。乔叶的《良宵》是一个有关底层女性的故事。女搓澡工渐渐接受了其卑贱的生活方式，并努力寻找着生活中的快乐。在与破坏其家庭的第三者偶遇时，她在艰辛生活中顽强建立起来的珍贵的安慰感，却瞬间破灭。从这些作品看，作家们都注重对人的内心世界和精神生活的关怀和探寻，这是一种对生存本质的透视。它们剥开了苦难生存的表面象，完成了对更深层次的灵魂创痛的揭示。

古往今来，无数作家以人道主义的立场，以大悲悯的情怀，书写着与人同在的悲苦与不幸，以此拷问着现实，思索着历史，体悟着道义与伦理，谱写出生命的悲歌与传奇。这些作品是一面面镜子，记录着人间的善恶美丑，映照世道人心，也激励着无数强者奋力前行。

目 录

编者的话

关于这本书·····金铎

温故一九四二·····刘震云 1

姑父·····王瑞芸 57

没有语言的生活·····东西 90

狗日的粮食·····刘恒 135

小呀小姐姐·····刘庆邦 151

清水里的刀子·····石舒清 166

扁担·····李锐 179

良宵·····乔叶 194

一九三七年的留声机·····盛可以 216

温故一九四二

刘震云

一

一九四二年，河南发生大灾荒。

一位我所敬重的朋友，用一盘黄豆芽和两只猪蹄，把我打发回了一九四二年。

当然，这顿壮行的饭，如果放到一九四二年，可能是一顿美味佳肴；同时就是放到一九四二年，也不见得多么可观。一九四三年二月，美国《时代》周刊记者白修德、英国《泰晤士报》记者哈里逊·福尔曼去河南考察灾情。在母亲煮食自己婴儿的地方，我故乡的省政府官员，宴请两位外国友人的菜单是：莲子羹、胡椒辣子鸡、栗子炖牛肉、豆腐、鱼、炸春卷、热馒头、米饭、两道汤、三个撒满了白糖的馅饼。这饭就是放到今天，我们这些庸俗的市民，也只能在书中和大饭店的菜单上看到。白修德说，这是他所吃过的

最好的筵席之一。我说，这是我所看到的最好的筵席之一。但他又说，他不忍心吃下去。我相信，我故乡的省政府官员，绝不会像白修德这么扭扭捏捏。说到底，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，我故乡发生了吃的问题。但吃的问题应该仅限在我们这些普通的百姓身上。我估计，在我们这个东方文明古国，无论发生什么情况，县以上的官员都不会发生这种问题。

还有一个问题，当我顺着枯燥泛出霉尿味的隧道回到一九四二年时，我发现，五十年后我朋友把他交给我的任务的重要性人为地夸大了。吃完豆芽和猪蹄，他是用一种上校的口气，来说明一九四二年的。

一九四二年夏到一九四三年春，河南发生大旱灾，景象令人触目惊心。全省夏、秋两季大部绝收。大旱之后，又遇蝗灾。灾民三千万，“水旱蝗汤”，袭击全省一百一十个县。

灾民吃草根树皮，饿殍遍野。妇女售价累跌至过去的十分之一，壮丁售价也跌了三分之一。寥寥中原，赤地千里，河南饿死三百万人之多。

“死了三百万。”他严肃地看着我。

我心里也有些发毛。但当我回到一九四二年时，我不禁哑然失笑。三百万人是不错，但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，无非是小事一桩。在死三百万人的同时，历史上还发生着这样一些事：宋美龄访美、甘地绝食、斯大林格勒大血战、丘吉尔感冒。这些事件中的任何一桩，放到一九四二年的世界环境中，都比三百万要重要。五十年之后，我们知道当年有丘吉尔、甘地、仪态万方的宋美龄、斯大林格勒大血战，有谁知道我的故乡还因为旱灾死过三百万人

呢？当时中国国内的形势，国民党、共产党，日军、美国人、英国人，东南亚战场、国内正面战场、陕甘宁边区，政治环境错综复杂，如一盆杂拌粥相互搅和，摆在国家最高元首蒋介石委员长的桌前。别说是委员长，换任何一个人，处在那样的位置，三百万人肯定不是他首先考虑的问题。三百万是三百万人自己的事。所以，朋友交给我的任务是小节而不是大局，是芝麻而不是西瓜。当时世界最重要的部分是白宫、唐宁街十号、克里姆林宫、希特勒的地下掩体指挥部、日本东京，中国最重要的部分是重庆黄山官邸。在这些富丽堂皇的地方，衣着干净、可以喝咖啡洗热水澡的少数人，将注定要决定世界上大多数人的命运。但这些世界的轴心我将远离，我要蓬头垢面地回到赤野千里、遍地饿殍的河南灾区。这不能说明别的，只能说明我从一九四二年起，就注定是这些慌乱下贱的灾民的后裔。

最后一个问题是：朋友在为我壮行时，花钱买了两只猪蹄，匆忙之中他竟忘记拨下盘中猪蹄的蹄甲。我吃了带蹄甲的猪蹄，就匆匆上路了，可见双方是多么大意。

二

我姥娘将五十年前饿死人的大旱灾，已经忘得一干二净。

我说：“姥娘，五十年前，大旱，饿死许多人！”

姥娘说：“饿死人的年头多得很，到底指的哪一年？”

我姥娘今年九十二岁，与这个世纪同命运。这位普通的中国乡

村妇女，解放前是地主的雇工，解放后是人民公社社员。在她身上，已经承受了九十二年的中国历史。没有千千万万这些普通的肮脏的中国百姓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和反革命历史都是白扯。他们是最终的灾难和成功的承受者和付出者。但历史历来与他们无缘，历史只漫步在富丽堂皇的大厅。所以俺姥娘忘记历史却一点没有惭愧的脸色。不过这次旱灾饿死的是我们身边的父老乡亲，是自己人，姥娘的忘记还是稍稍有些不对。姥娘是我的救命恩人。这牵涉到另一场中国灾难——一九六〇年。老人家性情温和，虽不识字，却深明大义。我总觉得，中国所以能发展到今天，仍给人以信心，是因为有这些性情温和、深明大义的人的存在，而不是因为那些心怀叵测、并不善良的人的存在。值得我欣慰的是，仗着一位乡村医生，现在姥娘身体很好，记忆力健全，我母亲及我及我弟弟妹妹小时候的一举一动，仍完整地保存在她的记忆里。我相信她对一九四二年的忘却，并不是因为一九四二年不触目惊心，而是在老人家的历史上，死人的事的确发生得太频繁了。指责九十二年许许多多的执政者毫无用处，但在哪位先生的执政下他的黎民百姓经常、到处被活活饿死，这位先生的确应比我姥娘更感到惭愧。这个理应惭愧的前提是：他的家族和子孙，绝没有发生饥饿。当我们被这样的人统治着时，我们不也感到不放心和后怕吗？但姥娘平淡无奇的语调，也使我的激动和愤怒平淡起来，露出自嘲的微笑。

历史从来是大而化之的。历史总是被筛选和被遗忘的。谁是执掌筛选粗眼大筐的人呢？

最后我提起了蝗虫。一九四二年的大旱之后，蝗虫遮天蔽日。

这一特定的标志，勾起了姥姥并没忘却的蝗虫与死人的联系。

她马上说：“这我知道了。原来是飞蚂蚱那一年。那一年死人不少。蚂蚱把地里的庄稼都吃光了。牛进宝他姑姑，在大油坊设香坛，我还到那里烧过香！”

我说：“蚂蚱前头，是不是大旱？”

她点着头：“是大旱，是大旱，不大旱还出不了蚂蚱。”

我问：“是不是死了很多人？”

她想了想：“有个几十口吧。”

这就对了。一个村几十口，全省算起来，也就三百万了。

我问：“没死的呢？”

姥姥：“还不是逃荒！你二姥姥一股人，三姥姥一股人，都去山西逃荒了。”

现在我二姥姥、三姥姥早已经不在了。二姥姥死时的情景我依稀记得：一口黑漆棺材。三姥姥死时我已二十多岁，记得是一颗苍白的头，眼瞎了，像狗一样蜷缩在灶房的草铺上。他的儿子我该叫花爪舅舅的，在村里当过二十四年支书，从一九四八年当到一九七二年，竟没有置下一座像样的房子，被村里人嘲笑不已。

放下二姥姥、三姥姥，我问：“姥姥，你呢？”

姥姥：“我没有逃荒。东家对我好，我又去给东家种地了。”

我问：“那年旱得厉害吗？”

姥姥比画着：“怎么不厉害？地裂得像小孩子嘴。往地上浇一瓢水，吱吱冒烟。”

这就是了。跟姥姥核对过，我又去找花爪舅舅。花爪舅舅到底当过支书，大事清楚。

我一问到一九四二年，他马上说：“四二年大旱！”

我问：“旱成甚样？”

他吸着我的“阿诗玛”烟说：“一入春就没下过雨，麦收不足三成，有的地块颗粒无收。秧苗种下后，成活不多，活的也长尺把高，结不成籽。”

我问：“饿死人了吗？”

他点头：“饿死几十口。”

我问：“不是麦收还有三成吗？怎么就让饿死了？”

他瞪着我：“那你不交租子了？不交军粮了？不交税赋了？卖了田地不够纳粮，不饿死也得让县衙门打死！”

我明白了。

我问：“你当时有多大？”

他眨眨眼：“也就十五六岁吧。”

我问：“当时你干什么去了？”

他说：“怕饿死，随俺娘到山西逃荒去了。”

撇下花爪舅舅，我又去找范克俭舅舅。一九四二年，范克俭舅舅家在我们当地是首屈一指的大户人家。我姥爷姥娘就是在他家扛的长工。东家与长工，过从甚密。范克俭舅舅几个月大时，便认我姥娘为干娘。俺姥娘说，一到吃饭时候，范克俭他娘就把范克俭交给她，她就把他放到裤腰里。一九四九年以后，主子和长工的身份为之一变。俺姥娘家成了贫农，范克俭舅舅的爹在镇反中被枪毙了。范克俭舅舅成了地主分子，一直被管制到一九七八年。他的妻子、我的金银花舅母曾向我抱怨，说她嫁到范家一天福没享，就跟着受了几十年罪，因为她与范克俭舅舅结婚于一九四八年底。但